

名家访谈

风景与人，才是我写作的初衷

丁帆 胡泊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读者也是构成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胡泊：丁教授您好，很荣幸和您进行这次访谈。据我所知，您似乎很少接受访谈，同时我作为一名一线编辑，也知道如今的读者还是十分渴望得到“前辈”“老师”等的点拨、指引，所以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私心的，想借此机会邀请您对现在的读者说点什么。

丁帆：谢谢你。写作40多年来，我一直都很尊敬编辑，我认为二者之间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文稿的修改完善工作。当我看到好编辑逐字逐句在文稿上留下的画红笔迹时，就产生无比的感激之情，我想，许多作者和编辑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原因就是他们为即将面世的作品，共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倘若二者有一方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或敷衍塞责，最终伤害的是作品。

同样，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也是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过去那种读者仰视作者的视角，应该消除，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读者也是构成作品完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品一旦进入市场，与读者产生了互动交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参与其中的感受，对于作家来说，那是最高的奖赏，虽然每一个作者都喜欢听赞美的话，但是允许读者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只要不是人身攻击，那才是作者最大的收获——了解各种读者的心理状态，对调适今后创作的路向，都是有益的。当然，读者也是分层次的，我更喜欢那种在精神层面能够读懂自己作品“画外音”的读者。

胡泊：您即将出版的新书《消逝的风景》，本来的书名是“南京风景”，后来改为“消逝的风景”，但是，您文中好似并没有对原生态自然风景的“消逝”感慨甚或失落，只是饶有兴致地打量自然文明景观、农耕文明景观、工业文明景观、现代商业景观——这样的“四叠纪”风景，然后用中性的、客观的笔触表现了出来。

丁帆：是的，我试图用一种客观中性的描写方式介入“四叠纪”的景观，其“消逝”一词的涵义就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历史性植入，对于每一种历史风景画，它给人类带来的心理感受，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迹，文明越进步，风景的反差与落差就越大。

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类心灵深处的悖反命题，这正是我与读者需要沟通的问题——我们只是风景的游历者，或是“看客”，还是从风景的背后，寻觅到历史沧桑给我们留下的思考？这也许就是看“死风景”和“活风景”的区别吧。

看风景没有人文思考在背后作支撑，就不能产生联想，那是浅层次的呆看。当梭罗的《瓦尔登湖》出版后，人类就开始了深度的人文思考：对消逝的风景充满着深刻的眷念，让我们对作者产生了浓厚的景仰之情。然而，当我第二次站在瓦尔登湖湖边时，我却在这原始的风景中，站在梭罗思想的彼岸，来思考人类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如何面对风景交替时的价值取向了。于是，风景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第四、第五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学科评审委员。有论著二十余部，另有散文随笔集十余部



胡泊，传播学学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资深图书编辑。另有小说集与翻译作品出版

与人，才是我写作的初衷。

当游历者、观光者思想失明的时候，风景秀丽只是一种单纯的视觉享受而已

胡泊：这种“四叠纪”的风景，我想许多人都有感受，但是一直只是生活在其中，没有想起来去观察和体会。

丁帆：我想，你提出这个问题，正是证明你和我一样，有着对风景同样的思考，而许多读者也都有同感，因为我们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究竟如何看待这些风景，做什么样的风景观看者，仅仅满足于视觉美感的享受，可能还是不够的，看不见风景背后大写的人性，其风景也是寡淡的。

胡泊：这样“四叠纪”的风景并非今日才有。许多人更熟悉您的文学批评，您曾经在《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中提到“现代性反思”下的价值困惑，提到作家沉溺于对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诗意化浪漫描写，正是出自作家的价值困惑，仿佛难以确立自身文化批判价值体系。

丁帆：对的，我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两难命题中徘徊着，这种古典的诗意美缠绕了我们许多年，深陷其中，不得解脱。作家们眼里往往满是原始风景的壮丽，站在今天生态文明的文化语境中，讴歌大自然之美，却忽略了生活在这种风景背后的人。当游历者、观光者思想失明的时候，风景秀丽只是一种单纯的视觉享受而已。

胡泊：我的祖辈是农民。您提到过的“文

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社会进程中适应困难、无所适从，我在他们身上好像观察不到，总觉得他们需要的依旧是物质富足，仿佛不需要“身份的确认”“灵魂的安妥”；这些困境，反而在这些年大城市的“新移民”身上看到更多。

丁帆：这一点也正是我上述提到的风景与人的核心问题：看风景的人往往都是衣食无忧的游历者。人的生存首先是温饱问题，这正是文化身份认同所造成的困境，犹如作家鬼子很多年前在《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描写的那个人既失去了农村身份，又在高楼大厦的城市里成了一个死亡者，麦田风景消逝了，瓦城的风景美丽吗？这个风景深处的意象让我感慨万端。

胡泊：农耕文明意识及其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着城市；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强大的辐射能力不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这两者的“交锋”最明显的时候可能就是春节了，外地工作的人回到“老家”，“老家”亲人迎接回来的游子，双方都会感受到思维习惯上的冲撞。

“四叠纪”的风景还可以拉开物理空间上的距离进行观察，而这种人与人近距离的“交锋”可能更令人无法抽身躲避，这种“交锋”让许多奔波的人困惑、为难。

丁帆：你的观察十分敏锐、准确，城市主人和城市的边缘人的交锋，的确是风景背后人文思想的交汇点——在同一风景下，“返乡”和“归乡”的情结只属于老一辈“城市异乡者”，对家乡和土

地的眷恋很快会在他们下一代中消失，这也正是“消逝的风景”留住农耕文明风景的目的。这种困境会在工业文明覆盖的城市逐渐消逝，其为难的困顿也就会在这群人的心里自动删除，除非他们又回归农村。

我一直提倡形象思维介入批评，在形象和抽象两种思维的交汇处奔跑

胡泊：可以聊一点您的私人爱好吗？我一直觉得唯有古典能抵御现实里的虚浮、焦躁，古典乐在您生活中有怎样的角色呢？

丁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两难问题，这一点在我的散文《古典的夕阳》中有所表现，实际上，古典的审美情怀往往是“海洛因”，饮鸩止渴，吸毒成瘾，就是对现代启蒙精神的销蚀。我喜欢古典夕阳之美，但只是它已近黄昏。

至于古典乐，不知道您指的是中国古典音乐，还是西方古典音乐。小时候我们都沉浸在中国古典音乐的旋律中，让我震撼的是《二泉映月》《江河水》，再就是《梁祝》。由于中西乐器不同，演奏出来有巨大的反差，在我看来，小提琴、大提琴拉出的旋律格外动人心弦，更不必说用交响乐演奏的音乐了。上世纪70年代用交响曲演奏的革命样板戏，再后来俞丽拿演奏的《梁祝》让国人倾倒。上世纪80年代末，我领略了西方古典音乐的魅力，尤其是交响乐的宏大气势和节奏变化的旋律表现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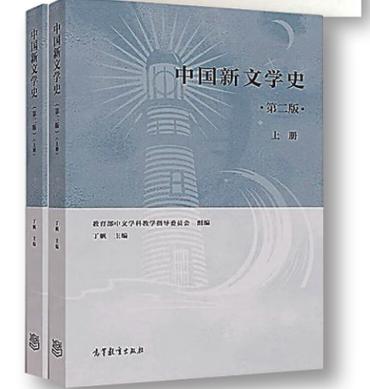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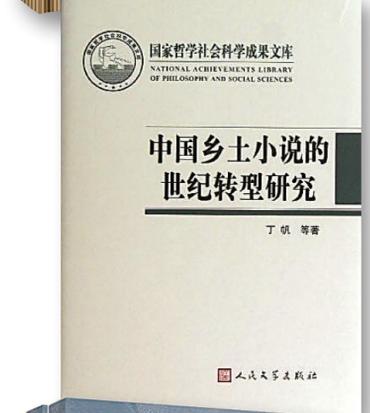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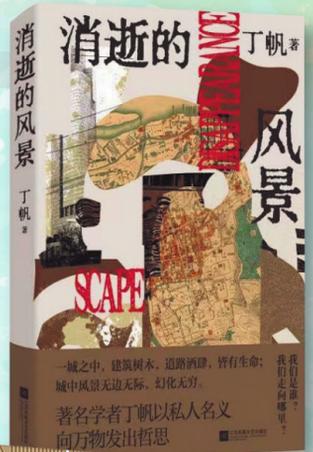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艺术的通感让我从中寻觅到文学创作中叙述的节奏感的真谛，那种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把握，是衡量一部作品优秀的重要标志，比如小说的节奏感，是作者对自己作品旋律把控能力的体现，明白这个道理的作家，才是一部交响乐最好的指挥家。

总而言之，世间的一切艺术作品的完美诠释都离不开一个情字，不能让人动情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胡泊：最后是我个人好奇的两个问题：写作随笔和做文学批评，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状态、创作体验吗？“文学最终的目的是使人从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今天文学依然有这样的功能吗？

丁帆：是的，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抽象思维，在我们这个学科里，引经据典的高头讲章，才算是真正的学术，而这恰恰让它失去了文学阐释的本义，一篇没有形象思维的切身体验的文章，无法表达一个文学批评者激情澎湃的内心感受，所以，我一直提倡形象思维介入批评，形成了写长篇“学术随笔体”批评文章的习惯，在两种思维的交汇点上奔跑，而一直从事散文随笔的创作，也正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

另外，文学能否让人们从现实解脱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一百多年前，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文学可以为理解作品的读者减轻痛苦的压力，却无法拯救人类，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它会成为历史转变的报幕人。



■ 评论

《四十年，四十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历史面影

□ 韩玉峰

2024年1月，一部装帧精美、内容厚重的图书与读者见面，即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十年，四十人——“茅奖”作家作品观澜（1982—2022）》。该书通过重温茅盾文学奖获奖者的代表作品，把握其创作整体风格，解析其文学创作，力图形成多元、立体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新貌。

《四十年，四十人》收入了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80位评论者对40部“茅奖”作家获奖作品的评论，所涉作品有：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东方》，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李准《黄河东流去》，张洁《沉重的翅膀》（修订本），《无字》，刘心武《钟鼓楼》，路遥《平凡的世界》，凌力《少年天子》，刘白羽《第二个太阳》，王火《战争和人》（一、二、三），陈忠实《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白门柳》（一、二），刘玉民《骚动之秋》，张平《抉择》，阿来《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一、二），熊召政《张居正》，徐贵祥《历史的天空》，柳建伟《英雄时代》，宗璞《东藏记》，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周

大新《湖光山色》，麦家《暗算》，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莫言《蛙》，毕飞宇《推拿》，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梁晓声《人世间》，徐怀中《牵风记》，李洱《应物兄》，徐则臣《北上》等。这些作品多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重要长篇小说，大都为读者耳熟能详，其中大部分改编为影视作品等多种艺术门类，受到广泛好评。40部作品引人入胜，每部配发两篇评论文章，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部鲜活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读者打开书页，可以读到当年茅盾先生写给中国作协的一封信。茅盾先生在信中写道——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

致最崇高的敬礼！

茅盾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13天后，即同年3月27日，茅盾先生驾鹤西去，这封信和“茅奖”的设立，反映了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该书主编梁鸿鹰在“写在前面”中更是详细说明了当时的情况：“1981年3月14日，茅盾先生口授，由其子韦韬记录誊写了他人世最后最重要的两封信，一封写给‘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请求追认为中共党员，另一封写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决定捐出稿费25万元，用以‘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给党中央的信，茅盾先生郑重地签下‘沈雁冰’三个字；给作协的信，他则签下‘茅盾’二字。茅盾先生口授这两封信的时候，距3月27日逝世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

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中国作家协会设立茅盾文学奖，以奖励长篇小说创作，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出，距今已经过去了40余年，设立茅盾文学奖对赓续和光大包括茅盾先生在内的现代文学大师开创的伟大文学传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茅盾先生是著名的大作家，也是杰出的文学理论评论家，他的理论评论中外融会贯通，注重文本分析，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1949年他在筹划和主持《文艺报》的时候，曾代编委会起草了《发刊词》，发表了文学评论《关于〈虾球传〉》。茅盾先生在大量行政工作之余，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理论评论文章，包括在《文艺报》连载的《夜读偶记》等。发挥理论评论的作用，辨析思潮、引领创作，对优秀作品及时开展评论是《文艺报》的一个重要优势。《文艺报》从2019年开始设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研究”专题，刊登在“文学观澜”专刊，意在通过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创作的回溯性专题研究，总结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经验，以启示未来，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

《四十年，四十人》可以说是抓住了好的选题，内容挖掘深入，编排设计精当，宗旨明确，着眼于鉴赏作家的代表作品，提高读者的审美

水平。本书收录文章对“茅奖”作家作品进行筛选式评论，较全面反映了“茅奖”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发展的历史面影，从整体上看是中国长篇小说在新时期40年间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80位评论者以当今的文学眼光回顾和评价获奖作家作品，实事求是、理念鲜活、知常明变、守正创新，对读者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来说，其一方面立足当下文学现场，对获奖作家作品的再阐释、再研究、再筛选，为获奖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和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从文学普及意义来说，为广大读者进入获奖作家作品提供了切实可靠的途径，有利于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鼓励大众了解文学、走进文学、热爱文学，进而推动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山西省文联原副主席）